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

文化同源 音乐异声

——中日韩三位现代音乐作曲家作品及其相关历史文化探究

宝 玉○著

Toru Takemitsu

Isang Yun

Chou Wen-chung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

文化同源 音乐异声

——中日韩三位现代音乐作曲家作品及其相关历史文化探究

宝 玉○著

Toru Takemitsu

Isang Yun

Chou Wen-chung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同源 音乐异声：中日韩三位现代音乐作曲家作品及其相关历史文化探究 / 宝玉著.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10

ISBN 978 - 7 - 81096 - 577 - 4

I. ①文… II. ①宝… III. ①音乐评论—中国、日本、韩国
IV. ①J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165 号

文化同源 音乐异声

——中日韩三位现代音乐作曲家作品及其相关历史文化探究 宝 玉著

出版发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印张：15.5

印 刷：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1096 - 577 - 4

定 价：48.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100031
发行部：(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母亲王玉芹女士！

自序

暮鼓时分打开电脑，笃志敲出本页置顶的两个汉字的拼音，结果电脑自动默认一排词组的第一个选项竟然是“自诩”，其后才是我所欲也的“自序”和我不欲也的“自许”、“子婿”等。卖糕的！难不成这不期而至的“自诩”就是那佛经禅帛中当头棒喝的机锋吗？自诩？在费力劳心之作就要付梓呈正的大喜当口，似吾等非深中隐厚者神摇魂荡地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划拉来一片“云彩”还真难不出人意料。况且在自序里自诩其法有如缀玉连珠般通合于取鱼而兼得熊掌，若此润凝得体又主次清明不意不亦乐乎哉？只是无论你是自己诩还是他人替你诩，都得在水木明瑟之杰境方能升腾出函谷关的紫气、抑或潘江陆海上的五彩云霓。当然，如若二者实难得兼，唯拙实舍诩而取序者乃为仁也。

本卷所及的研究方法是围绕被研究者的艺术与人生之点、线、面来做多方位的立体观察。之所以从这个广角切入，其根本还是在于我对时空中的人与艺术及其生活在创作层面上互为产生导引和汲养的设想、观察与思考。依我浅目所及，艺术结果的差异，其实质是个体生活的原发性的不同，或者是创作者本人因时、因地、因人的客观性不同而产生突发性之主观表现。再或者因观察者的个人视角而导致对同一主体的异象观察结果的差异。事实上，生活中的我们都会因不同的人生曲线而产生不同的人生观，并直接导致艺术上的特有品味；都会自觉地因不同的现实处境而能动地选择生、旦、净、末、丑等不同的脸谱，以随物理之机应变，同时随角色定格应运而生的还有相应的语言、行为甚至思维方式。那么据此是否可以说，不但在创作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即便在创作者本体上也存在多元的性格差异呢？这当然可以做为不落窠臼的某些大师们对于涉己的乐评和作品研究不置可否的内中根由之一而引导我们寻得人艺相成的不二法门。求得道者之道的我等是否考虑过从跪拜大师的牌位前从容起身，毅然登高，对他做一次全近景推拉式观瞻，以探究是超群的技艺还是绝代的情怀成就了那些灿若星辰如武满彻、尹伊桑和周文中等至圣先师的呢？可曾想过，也许在我们埋头于钻研先师杰作而苦苦不知所终之时，三位年在桑榆的亚裔作曲前辈在同根文化中却殊途殊归地抵达各自的艺术神殿，正望着我们拈花微笑呢。

俗语说“画匠不给神磕头”。窃以为是因着画匠知道神是哪个坑里的泥做成的。这种工艺的流程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对神至少是神像的礼拜崇敬之情。那么对于我们所服帖的、敬若神明的大师的研究是否也该从“乐匠”的工艺角度去解构、辨析我们的乐神是出自哪个坑里的泥呢？至少我们应该既能看到大师其工有多精妙神奥，也应该有能力看到大师之情少不了离经叛道。这种秉持客观唯物论而非主观唯心论的态度来看待出神入化的人而非定

于一尊之神之杰作于音乐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视觉定位与庖解定则。大道至简，大象无形。无形实为多形，非常形。是为道可道，非常道也。所以那些被后世宗仰的大师具有性情的多面性在此是自不待辩的，甚至在他们自身生活中的惊世骇俗之作为也同样是与情相生，与理相克，难究正反与善恶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经典巨制的工艺流程中应避免管窥蠡测而倾力变换角度、厘定经纬、腾挪空间、查考推敲，不惮其烦。此理正如苏轼东坡于《题西林壁》诗中所偈：“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勇于跳出“此山”看“此山”。从看此山是此山，到看此山不是此山，再到看此山还是此山或许能让我们期许的大师们不期披挂不虞之甲也未可知焉。

红尘万象，千人千面，一佛百态。就像有人说宝玉愚顽是对的，也许他曾经是我愚顽的受害者。有人说宝玉这厮身上带有匪气也是对的，因为浓酒烈情可能是游哉牧哉的蒙古土著血统中淘换不尽的基因。或许也有人觉得宝玉这家伙其实挺像个学者的，嘻嘻，那至少说明他看到过我的这篇打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多年来作曲专业的博士论文寡为优秀之纪录的雄文。而另据保守估摸，我往昔的女友会说我宝玉是个颇解风情的儒生雅士；而那与我摸爬滚打、养育儿女的阔太则一定会抗辩说宝玉就是一个俗人。当然，友亲若说宝玉这厮是个大忽悠也不会完全没有根据。的确，我不能自主地将本我、自我、超我时时地统辖于一个精神空间而不侧漏，就如同我至今也没能将自己之精神皈依于任何一派具体的宗教一样。其远神疏佛之宿命不惟我的慧根薄浅、诚敬不专且在于普天之下诸宗教之间的教条确有犯境相左之处，使得我这个一根筋的草芥面对各门神道之短长难奉其宗义而颂、难择其桂枝而栖。然经敛气沉心地翻典检经后，我豁然洞悉其诸教之威仪，即：如果把各宗教教义像巫道术士炼丹一样焚汇于一炉熔炼，经焙烧筛异、升华趋同，最后凝成的一定是真、善、美三个字，而真、善、美三个字也一定是各家宗派劝诫显贵、超度普罗的共同主旨。如此，我信仰这“三字教”就等同于我皈依了所有信奉真、善、美三个字的教派。假使横竖比量着这个三生万物成一统的蒸馏模式以净化我们的音乐分析与研究学科，那如星际般的每个风格流派以及派系内浩瀚如星空般的作品不也都是三位一体的音、形、意的不同摆放与结构组合吗？武满彻的以形化音达意与尹伊桑的以音达意化形，以及周文中的以意达形化音不啻五花八门的宗教于“三字教”——真、善、美——的大一统一般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我们该谨记，每个探向历史的镜头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焦距和取景框而不仅仅是踟躅于A级风景区的固定机位及拍点。不做“神”云亦云的传道士；不沦为汉一王符在他的《潜夫论一贤难》中慨叹道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伤世之不察真伪之情也”一样的殆因学而不思的守墓人。

大时代中所谓文化的进步其实很像是一块奶酪的发酵、变质的过程。它往往是以行业的肌体萎缩与受众流失为其艺术革命的代价。比如，无限的抽象导致无限的自由正是导致现代美术空乏其身并最终被妖魔附体反误了卿卿性命。悲喜嗟乎皆成诗然任无章法、不胜其乱导致风动、幡动、心不动的诗歌荒时暴月，涂炭遍地诗人，但我们如何注意到每一支主流的或非主流的美术流派都留下过让世代窃匪和藏家梦寐以求的旷世墨宝；每一种看着

着调的或不着调的韵、仄、律、格都有让优伶骚客扼腕兴叹的绝代诗品是怎样的不以辞害志进而做到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的呢？音乐！对，还有音乐。在乐音的闺阁被蛮气十足的噪音一点一点地踏平了门槛；在结构音乐已然成为音乐家独乐乐的蒔圃与棒喝众乐乐的神器的后现代的当下，任何一种已知的流派、学说及其理论只能也只能权充日渐发福的音乐辞海中的一个词条、词目而均不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王道。没有了万众一心的教条与清规戒律是因为没有了众望所归的美学标准，就如同没有万众顶礼的乐神是因为没有了亿万信众垂青于乐人的膜拜。清明上河，公婆究理，各执一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折子戏构成了当今艺术圣殿之上并非朗朗的乾坤。然而，在音乐百草园中那些因大作而成就大师或反之的殊方异类却无一不是仅尊物竞天择，唯心者存之上法大道。因此，万籁所依的撼人之美的艺术一定是，也只能是源于心灵这个户枢而决然不会是那面飘扬在各自徒子徒孙所把守的碉堡之上的战旗。

在为本书作序期间，我敬爱的母亲王玉芹女士于京辞世。在此请允许我这个不负艺术，然负生活的“逆子”不揣冒昧地借牋寄托一份由衷的哀思于她吧！

宝玉——2013年5月18日癸巳年四月初五于京北水帘洞

目 录

自 序	(1)
绪论 I	(1)
绪论 II	(15)
绪论之续	(18)
第一章 玉树临风	(20)
第一节 311 定理分析	(20)
一、三点——尹伊桑 韩国 西方	(20)
二、一线——尹伊桑之音响观	(23)
三、一面——尹伊桑的作品风格	(24)
第二节 尹伊桑《穆瓦克舞蹈幻想曲》之音乐分析	(26)
一、“主要音”及“主要音响”观察	(26)
二、音乐结构分析	(35)
三、音高结构分析	(49)
四、音响形态分析	(59)
五、音乐全景图表	(66)
第二章 踔厉乱画	(67)
第一节 311 定理分析	(67)
一、三点——武满彻 日本 西方	(67)
二、一线——武满彻之音响观	(70)
三、一面——武满彻的作品风格	(71)
第二节 武满彻《幻影》之音乐分析	(73)
一、“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74)
二、音乐结构分析	(78)

三、音高结构分析	(84)
四、音响形态分析	(92)
第三章 好好做自己	(134)
第一节 311 定理分析	(134)
一、三点——周文中 中国 西方	(134)
二、一线——周文中之音响观	(137)
三、一面——周文中的作品风格	(138)
第二节 周文中《花落知多少》之音乐分析	(140)
一、“四度音程”与“转基因改造”	(141)
二、音乐结构分析	(151)
三、音高结构分析	(186)
四、音响形态分析	(205)
结 论	(220)
参考文献	(223)
附 录	(228)
附录一 尹伊桑音乐作品目录	(228)
附录二 武满彻音乐作品目录	(232)
附录三 周文中音乐作品目录	(236)
后 记	(237)

绪 论 I

一

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著作《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的前言中引用了布莱希特在他的剧作《伽利略传》中引用的伽利略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①究其言而推论之，伽利略如是说，想必有对经典力学假定两点之间在理论上是无障碍论断的反讽意味；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如此引用，大概是出于其传记体文学的叙事特质；而身为印度“庶民研究”又称为“贱民研究”或“底层研究”学派主将的查特吉如此这般地一再引用，则不能不说他是借此概念来表述在混乱无序的各民族主义之间的政治及文化领域中，既不可能不存在主观障碍，但也不可能在两点之间不存在联系的可能性这一客观真理。正如以研究世界文明问题著称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现代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任何所谓普遍有效的假设，诸如理性或进步、自由，都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尺度……^②文明并非一成不变，它有能动性，同时又有稳定性。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相互传播和借用，既把自己的东西向外输出，又借用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东西，这种借用是有选择的，即借用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丰富自己。同时，文明又有‘拒绝借用’的特性，即拒绝借用对自己不适用的东西以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稳定性。大体上说，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一般说来，各个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和主流。^③此意约等于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的：所谓世界通史，我的理解是，它不同于所有各国的历史的组合，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不是记忆的负担，而是启人心智的智慧。它贯通上下古今，各民族的历史在这之中只起辅助说明的作用。各民族历史的叙述，

① 〔印度〕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② 周宁：《世界是一座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建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③ 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页。

不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而是根据它们同更高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关联的程度来决定，即根据它们对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作出的努力的时间和程度来决定。^① 概言之，世界上现存的任何一种文明的进程都是在一个开放交流、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其在器物、制度与思想等层面上的系统进程。不同的区域文明是相同区域中的不同的民族文化溢出自身文明本体于“两点”之间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所交融成说的跨文化或文明的部落纲纪，概莫能外。

不宁唯是，世界上的区域文明之间——如因地域形成拉丁美洲文明板块，因宗教而连成伊斯兰文明板块，因地域、宗教以及独有的儒家文化而凝聚成的东亚华夏文明板块——也不会是封闭、绝缘地自我发展，都存在着穿越或迂回“两点”之间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的主、客观障碍而进行时间与空间的本相对接。必定成为历史的现实文明是与历史具有或显或隐的曲线联系的，是历史的生动体现；是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包括衣食住行、生产工具、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将这个总和做进一步提升，便可融而凝之为现今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和文化思想的统一体。所以，从文化生态学这个角度上说，我们首先避免孤立地看待文化间的差异性，更不可以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只摘取本族群文化的历史起点和现实高点，而后自大地在两点之间以一条直线贯穿了事。现实的文明和文化是远古的文明和文化之根、之源的一脉相承的延续及一波三折的发展，都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环境创造出的特定“物质”，既人类非物质文化，也被称为“软实力”或“软国力”，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特指与一个集团、民族或国家在经济、军事与科技上的“硬实力”或“硬国力”相对应的国家文化形象和民族文化影响力的现代政治学概念。而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特定“物质”与其他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环境里创造出的特定“物质”在人类的迁徙、传教、经商、通婚以及战争、入侵、殖民等过程中，将自己产生于不同风土历史、社会政体及经济模式下的特有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与其他异族或异域文明经冲突、并存、融合，变异为当下世界文明史上“和而不同”的多元文明的格局。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汝信教授所总结的“文明的共性和文明的特殊性、多样性并非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地统一的，其共性即寓于特殊性和多样性之中。”^② 旁征博引至此，远眺近观仍觉略显空而且幻，若则铄金的确需要鼓足勇气弃冗、偏、生、冷的哲学概念如敝屣而后方能抽象出“文明是纲，文化是目”这一素朴之微言。遂，擎此论点论说开去，一个相对单一“质”的文明当涵括绝对复杂“量”的文化，也就是说，所谓文明，既是大写的文化。或者说，广义的文化即文明，一定是一个含有至少一种乃至多种文化发展、汇集而成的具体文明，是同样具体的文化之客观实体。如此，我们即可抽绎条理并进而认同“在一个轮廓通常比较模糊的地理空间内，文明的定义就是指在一定社会范

① 周宁：《世界是一座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建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② 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汝信：总序》，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页。

围内，人们所见到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现象的总体”，而“文化则属于一个更为主观的范畴。传统的定义认为，文化的概念是指人为了通过艺术、文学和科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和情趣，所需获得的知识总体。获得这些知识主要依靠教育和传播媒介。”^①

盘点当今世界因人种、风土、观念之迥然而形成的区域文明，当属东、西方文明之“两大据点”间的间距（Space），也即“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为巨。历数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频繁闪现的字眼，大概“东方（East）”、“西方（West）”、“东西方（East and West）”一词堪称魁首。究其所以然，当是两大文明各得其源于远古，觉尝正果于近朝。其地理人文异乎于邻，风俗信仰差乎于彼。正可谓雄关漫道，天各一方。但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之生存本能和经漫长的进化所升腾出来的求索之精神，使得东、西方文明悠久的历史往来又一次验证了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牛顿的“引力定律”同样具有史事考证的人文价值，“任何两个物体都相互吸引，其引力大小与每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物体之间的距离越远，则引力越小。”^②虽则客观上的东、西方文明之“点”距远、引力小，但由于其两者自身的相当质量之大、各自的文明其放射性之强，故而也终不至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东方，也即地球的东半部。在制图学上，通常把西经20°起向东到东经160°止的半个地球称为东半球（Eastern Hemisphere）。陆地包括欧洲、非洲的全部，亚洲、大洋洲的绝大部分和南极洲的大部分。与东半球相对的自然就是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既：西方——地球的西半部，亦即从西经20°起向西到东经160°止。陆地主要包括南北美洲以及南极洲的一部分。^③西方“据点”沿革古希腊文明的传统并在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文艺复兴、创造了人类史上辉煌而广泛的现代文明。而面对面的东方“据点”则承袭比西方“据点”更古远的中国、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为传统，并以其独有的精神意识、思想理念创造出不啻灿烂的近代文明。如果我们在此借用制图学概念下的经纬定位线并假定今朝的世界文明之分布确呈板块状格局，同时姑且抛开西方极端民族主义学派话语权下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或“欧洲文明中心论”，和东方民粹论者法理求证中的“东方文明基石说”^④来给双方做文明坐标定位的话，那么，因异而依、依异而立的东、西方两大文明均不处于中心地位。依此立论，处于中心地位或仍称为“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的必将是双方各自“据点”中游走出来的人为各自文明载体而溢出“点”的文明本体的第三类文明——人类文明或称世界文明，在此姑妄言之为“合成文明”。亦即，这个

① [法] 阿尔德伯特（Aldebert, J.）等著：《欧洲史》，蔡鸿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9页。

② [英] 史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③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316、1387页。

④ [美] 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人类的故事》，冯士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文明是凭借作为“点”而存在于各自文明“据点”之中的人的迁徙移动，进而蔓延为族群渴求生存而向外“点”扩张时所留下的轨迹——“线”——因“点”的相互间不同方向、张力的运动必然形成显性直线与隐性曲线的错综相接、相容而创生出的“面”在必然量的漫长蓄积和融会过程中所必然凝结成的天然产物。“点”是从一个文明实体到另一个文明实体的通道和桥梁。“线”的简单与复杂变化在于作用力的不同和方向的变化。点与点不对接就永远都是点，自然不会产生由线而面这一符号转换的质变结果。点对点的对接也就是线与线的交汇；而线与线的交汇必然产生因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循环往复而润和、框定成“面”这一独立实体——“合成文明”。而其中无障碍的显性直线是人的共同身份认同的表象；有障碍的隐性曲线则是不同政治诉求下的文明本质，既“隐性结构（Veiled Construction）”^①。这种表述潜隐着与20世纪西方抽象主义的开派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美学思想有着内在的类缘关系，“每一种现象都可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体验，这两种方式不是随意的，而是与现象相关——它们取自现象的本质，取自同一现象的两种特征：外在的——内在的。”^②

从语义学上说，人是民族的从属概念，但民族并非一定是国家的从属概念。国家是地区的从属概念，而地区又必定是世界的从属概念。人，是指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能思维，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进行语言交际的高等动物。民族，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国家，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由固定的土地和人民组成，有一个进行管理的组织的共同实体，或指一个国家政权所领有的整个区域。地区，是指某一范围的地方；较大的区域，特指在国际上相对国家而言，指一国中在特定情况下单独参加某些国际活动的地方行政区域。世界，是指佛教所指的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指地球上所有地方；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客观存在的总和。^③ 在人、民族、国家、地区和世界这五个内涵相互关联的名词中，只有民族与国家在其语义学概念上有着些许重叠的内涵。而内涵的重叠在逻辑学上意味着概念的独立。也就是说，民族不但具有国家的一切属性，如固定的土地和人民，管理的组织亦或政权，还具有自身的语言、文化、风土等共同实体的内在与外在的本质特征。民族既是国家的客观存在，又是国家概念名至实归的主体。国家不能脱离民族而立；民族却可能脱离国家而生。因之，民族也可替代国家概念，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④ 仅从现今国际政治的实际看，国家的联邦制度与区域自治的政体实践虽然客观上加大了民族与国家在行政上的隔阂、分化，但它们之间确也保有着

① 〔俄〕康定斯基：《论点线面》，罗世平、魏大海、辛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② 〔俄〕康定斯基：《点·线·面》，罗世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③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1095、912、497、291、1189页。

④ 同上，第912页。

内在的、不离须臾的血肉联系，既：民族是文化的载体；国家是文化的总和。所以，对于多民族国家我们完全可以说，民族是国家的组成分子。而对于单一民族的国家我们也可以说，民族既是国家本身。究其实而总之，人是民族文化中的“点”而“线”则“面”；民族文化是国家文明的“点”而“线”则“面”；国家文明是地区文明的“点”而“线”则“面”；地区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点”而“线”则“面”；而世界文明则是全人类所有文明或“点”或“线”或“面”的交融、凝结而成的现代文明的“坐标系”。任何历史的文明和文明的历史都可能在此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相应的“标点”——这，或许就是本节所要得出的结论。

二

如果出于研究的目的庖解现代合成文明中的两个最大的地区文明板块，非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莫属。然而，东方、西方这对儿原本源于地理学研究意义上的；为确定地球坐标或时区而假定的学科术语，现如今正在失去以本初子午线为坐标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区域划分的学术规范性；更多地则被文人、政客、商贾作为全球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专有名词或在表述人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观念差异时的固定搭配和定冠词（the Definite Article）。

造成东方、西方两大学术名词的内涵与外延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范畴内的彼此相左的事实，多半是由于划时代的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所导致的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形式表现出的连锁反应，既：这些革命给了西方政治、经济以前所未有的、不可估量的推力和力量，并由此导致区域经济、地缘政治的不平衡、不对等，进而使得“西方”一词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逐步演变成了借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集体代词，特指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共和制度，文化上的基督教地区。由于这些国家大部分集中在欧洲和美洲，所以有时也称作“欧美国家”。源于此，“西方”一词由最初只是地理概念，现在却越来越明确它的文化概念了。如是，政治经济学概念上的西方和东方与地理学概念上的西方与东方各自具有了不同所指的本质属性。

鉴于地处东方版图的欧洲（主要是西欧）与美洲（主要是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已然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所以在现今国际事物中所指的“东方”，一般特指亚洲；“东方人”，则特指亚洲各国的人。亚洲，是亚细亚洲（Asia）的简称。位于东半球的东北部。东临太平洋，南临印度洋，北临北冰洋。西北与欧洲相接，西南与非洲相邻；东北隔白令海峡与北美洲相望；东南以帝汶岛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面与大洋洲为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洲。^①而东方的亚洲作为一个相对于欧美的西方的一个集

^①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1495页。

合名词，又分为东亚、西亚、南亚和北亚。东亚（East Asia），位于亚洲的东部，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等。虽然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已然分立为如今的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但从研究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角度着眼，仍有必要将今日的朝鲜和韩国还原为昔日的朝鲜半岛这一整体来加以论述。故而本绪论中所指的朝鲜是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个文化整体，而本书：《文化同源，音乐异声——中日韩三位现代音乐作曲家作品及其相关历史文化探究》——的研究对象亦将在地理位置相邻；文化传统相像，盛有“东亚汉文化圈”，或称“中华文化圈”^①之说的东亚三国中遴选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风骚，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进行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的探究。他们是：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

纵观当下国际政治，区域内的协调合作——如欧盟、东盟、上合组织等——分化着原本由上世纪东西方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操控下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化或无极化转变，而在21世纪以市场经济为主要背景的全球一体化的新格局面前，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区域化合作更是全球范围内的一大发展趋势。在这些或明或暗的合作体当中，区域认同尤其是文化认同则是区域化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前提。然而问题的提出可能并不在于认同甚或归依本身，而在于文化认同后所形成的区域文明的超国家性也许并不能真正让那些自盘古开天时起就处于同一向度的列国子民，在区域化大潮的裹挟下面对自己民族和家国的历史嬗变无动于衷、随波逐流——尽管区域和文化的认同实际上仅是对其所处的地理空间性和历史时间性事实的理性认知。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德卢什在其合著《欧洲史》一书之序言中引述19世纪一位作家所说的，“上帝无论怎样万能，也不可能改变过去，所以他创造了历史学家。”^②在人类惯于以史为鉴的现实生活中，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书写的历史读本。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历史学家，或者至少可能成为历史的学家。那么，为了实现区域内共同的政治社会学的目的而拆除政治、经济和文化自我循环的壁垒不心虚；跨越思想、意识和观念唯我独尊的边界不气短；摒弃个人、氏族和国家本我唯上的参考系不腿软就将不再是区域内各民族与国家的感性纠葛，而代之以理性支配下的史籍整理和史迹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们即要索隐穷源、震衣提领地确立区域文明的主体文化，又要杜绝自鄙以下、不屑于人的傲慢作风以保证其区域内的文明多样性。对其史实不明之史事应不惜以牛鼎烹鸡之气度加以论辩求证，并力求达成不差累黍的历史共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有效地合力防范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各自麾下的民族主义者在其锦句强词声中仍勉竭绵薄地在自己的历史馆藏内擅权为其民族描绘一个有“源”、有“流”、有“波”的“清明上河图”。诚然，大多数情况下的人类历史都存在于各自表述的话语中。历史上的事实也未必是事实

① 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序。

② 〔法〕阿尔德伯特（Aldebert, J.）等著：《欧洲史》，蔡鸿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页。

上的历史。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历史学家们有能力、有信心、有魄力透过宇宙的尘埃，穿过历史的谜团，绕过现世的藩篱发现并因此领会在人类文明复杂而漫漫兮的进程中，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要大大地多于盲目性与偶然性。通过疏浚历史河道，舛讹归正，必也遐迹无愆；通过耘沛文明根系，本固枝荣，然非靡有孑遗。然也，定可找到本民族文化的“显性结构”；各区域文明的“隐性结构”，诸地区文明的“对应结构”，进而分解乃或重构激进民族主义思想史在当代所窃据的政治意义。

东亚三国从历史之中寻找区域认同的史实可追溯到中国的隋唐帝国时期。至于三国之间的民间交往的传说以及史迹专家经考古学研究所推断出的民间交往的起始时间则更要早于史籍记载——中朝始于商周；中日始于春秋战国；朝日约始于3世纪。

中、日、朝三国同处东亚，毗邻而居——中朝唇齿相依，中日一衣带水，日朝一海相连。根据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以及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古代中朝之间的交往开始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中国商朝的纣王的叔父箕子入朝后建立的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箕氏王朝。由于箕氏王朝以及其后的卫氏王朝的建立者和统治阶层主要来自中国，相同的民族信仰、族群文化和相连的国土江山等天然的亲和性因素使得他们与中国长期保持其藩属关系。加之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灭掉卫氏朝鲜后，置郡统治、鼓励迁徙，那些生活在朝鲜半岛的中原移民自然地给朝鲜半岛带去了丰富的殷商文化和先进的耕织技术，并同朝鲜人民一道创造了史上著名的，以中国儒学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朝鲜“乐浪汉文化”。始于战国末期并持续于秦汉帝国统治时期的“走海东”^①的中国移民潮，以及朝鲜半岛派出大批遣使来中国学习、引进并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客观上为中朝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而古代中日之间的交往，若在此不计尚有争议的先秦时期“徐福入海，赍书东渡”、“秦民东渡”日本的传说，汉光武帝赐金印于倭王则是两国政权之间有史籍确切记载的确切往来的实物例证。古代朝日之间最初交往的主体及其汉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战国、秦汉之际那些为避战乱而来到朝鲜半岛的中国先民，以及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置“汉四郡”统治时期生活在朝鲜的中国人向日本再迁徙的移民，也既日本史籍中所指的“渡来人”、“归化汉人”^②。如是观之，古代的朝鲜半岛与中国明清政权之前所持续的藩属关系在客观上又成了古代的中国文明传播到日本列岛的重要驿站和主要栈道。

中国的文明起源是东亚三国中最早的，也是发展最为系统的。中国文明大体上是在封闭的、纤受外界影响的客观环境下独立源发而成的独特形式和风格。发轫于远古的汉字和儒教、道教及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跌宕昭彰，独超众类，尤其是盛唐时期的中国唐文化对日朝两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艺术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道如青天，李白仗

① 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6页。

② 同上，第51页。

剑远游的那些年里，中国就是世界”。^① 东方神秘的文明古国其疆域广袤、膏腴；子曰诗云浩博、灿烂，区宇一清，倭夷趋之若鹜，昌盛华夏尽可谓知识之渊藪，文明之祥地，其深邃的哲学思想体系和高尚的人文科学均以其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巨大的意识凝聚力，振奋和吸引着东亚诸国。“中华文明模式后来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而且至今依然是这些国家的读写文化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有时被称为‘sini. 文化’（拉丁词“sinic”意为“中国的”），这种文化也继承了大部分中国传统的农业方法和中国模式的书写体系、哲学、文学、政治及社会机构和艺术。”^② 具体地说，从中国的汉魏至明清，古代中、日、朝三国之间就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日朝两国频繁地派出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赴中国学习先进文明。大批由中国官方派遣和民间游历的僧人及学者东渡日朝访问交流，汉文化及其儒家思想也通过此渠道得到了传播。并由此形成人类文明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东方文明和汉文化区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日朝三国在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文化上的协调发展。

现今中日朝三国的文字虽然各异，但汉字却是三国文字的不二渊源。既，“现在在东亚使用的文字，是在古典汉字、汉文的基础上在各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中产生的。”^③ 中国的汉字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仰韶文化陶器上刻画的象形符号逐渐演化而来的，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目前以中日朝三国为代表的三种东亚国文字，是世界上唯一属于汉字型或称方块字文字的国家。朝鲜文和日本文都是受到中国汉字的影响而创制出来的。汉字作为承载汉文化及其儒家圣哲思想的重要构成，随着中朝、中日、朝日彼此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的密切往来和交流，必然会大量地融入到朝鲜和日本语言的创造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中。在朝鲜世宗王于1446年创立朝鲜自己的拼音字母符号“训民正音”^④ 即著名的语言文字“谚文”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朝鲜还是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其国家行政所使用的书面表达一直都是借用汉字来完成的。日本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所以在日本根据中国汉字的偏旁和草书分别创造出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之前就已开始广泛地吸收中国的汉文化，当时被称做“万叶假名”^⑤ 的所谓日本文字其实就是借用整个的汉字音符来写日语。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借用汉字作为高级应用文字的。即便今日日本已经拥有了自己独有的文字体系，但其中仍保留、掺杂有大量的汉字原形和中国语汇。进而言之，日本文字的创制是借鉴汉字的结果。汉字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及其思想精神体系能够数千年绵延不绝，继而影响

① 周宁：《世界是一座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建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② 〔美〕罗兹·墨菲（Murphey, R.）：《亚洲史》（第四版），黄磷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

③ 中、日、韩三国学者编著：《东亚三国的近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第76页。

④ 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20页。

⑤ 同上，第223页。